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内涵释义、 生成机理和长效治理

赵海堂

摘要: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聚焦视角是实质自由,内在根源在于可行能力不足,具有多维性、相对性、持续性、动态性、分散性、代际传递的特点。老龄化和风险社会的情境要素,贫困文化掣肘内生动力的文化要素,社会保障、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本的结构要素,以及主体性、建构性和嵌入性的三维困境的行动要素,均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应采取多维识别方法,践行多元共治模式,完善发展型社会政策,满足农村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进而促进农村老年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共同富裕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013

收稿日期:2022-09-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社会保障调节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效果测评及其政策优化研究”(17ASH009)、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民众慈善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YJ2022-QN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海堂,男,四川南充人,管理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农村贫困治理,E-mail: zhaohaitang@cdut.edu.cn。

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反映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现实议题,也是一个被时代赋予新要义的学术论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各有侧重。伴随着中国取得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2020年之后中国贫困治理开始转向解决相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得农村地区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主战场;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群体,农村老年人群体更容易陷入相对贫困。“城乡相对性”与“群体相对性”的相互交织,使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障碍之一。

中国相对贫困问题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解构、多场域论证、多方法求解的特点,但既有研究主要从整体性视角研究中国相对贫困问题,如仲超和林闽钢探析了中国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①,李莹等采用收入比例法测算了中国相对贫困的规模^②。从异质性视角深入分析不同群体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较少,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为缺乏,未能系统化地认知农村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基于此,本文提出“元问题—源问题—衍问题”的三维理论认知进路,深入剖析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内涵释义、生成机理和长效治理。元问题是指某一现象是什么的内涵问题,包含聚焦视角、本质根源、表象特征等子问题,本文从聚焦视角、内在根源、主要特点明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内涵释义;源问题是指某一现象产生的源起问题,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源问题是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衍问题是指某一现象产生后所衍生出的决策策略问

^①仲超、林闽钢《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12页。

^②李莹、于学霆、李帆《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算》,《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第31页。

题,本文所讨论的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衍问题就是在内涵释义和生成机理基础上关注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

一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内涵释义

(一)聚焦视角:从物质财富到实质自由

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更多地关注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所掌握的物质财富情况,并据此测度其贫困程度,瞄准政策所需要惠及的对象。较多的收入和财富代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较高,而贫困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的物质财富匮乏。正是这种感性的配对效应,使得部分学者将农村老年人贫困等同于收入贫困。将物质财富作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关注焦点,会出现忽视不同个体将福利转换为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差异的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福利和实质自由差异的五种主要来源:个人异质性、环境多样性、社会氛围差异、人际关系差别、家庭内部分配^①。从个人异质性分析,农村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失独老人的生活处境和需要不同,所需要的处境劣势“补偿”也不尽相同。从环境多样性分析,不同区域的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自然灾害等环境境况各异,继而会影响其将资源转换为想要拥有的生活状态的难度。从社会氛围差异分析,相比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拥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资本等社会条件相对不足,这会增加其改善实质生活状态的成本。从家庭内部分配分析,老年阶段的生活福祉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反哺,尤其是精神慰藉和日常照料,因此,家庭结构、成员数量、经济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正是源于农村老年人群体将物质财富转换为实质自由方面的差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聚焦视角不应是收入的绝对匮乏抑或相对不足,而是更为一般意义的农村老年人实质自由。农村老年人的实质自由是指农村老年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即可行能力,包括摆脱饥饿、避免疾病等基本可行能力,以及政治参与、社区生活、教育等其他功能性活动。实质自由具有评价性作用和实效性作用。前者从规范性角度阐述发展的首要目的是实质自由,要基于社会成员所享受的实质自由,而非实际收入、效用和形式自由来评价社会的成功与失败;后者从个人主体地位视角阐述实质自由不仅是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也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关键因素^②。

(二)内在根源:可行能力不足

收入不足是农村老年人陷入绝对贫困的内在根源,如果将其作为农村老年人陷入相对贫困的内在根源,就会忽视农村老年人处于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双重弱势处境的脆弱性特征,低估农村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农村老年人的返贫风险。农村老年人往往是年龄衰老和疾病缠身的脆弱性结合体,容易引发“转换障碍”和“赚钱障碍”^③。前者是可行能力被削弱,后者是实现发展手段意义的赚取收入能力下降,且转换障碍会不断放大赚钱障碍的难度。农村老年人可行能力不足这一真实贫困状态,比收入维度反映的贫困状态更严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是一种多维相对贫困,表现为农村老年人在养老医疗、住房条件、营养水平、基础设施、发展机会、社会关系等多维生活域的相对缺乏境况。这种多维视角的相对贫困,内在根源是农村老年人可行能力不足,即农村老年人追求自己有理由珍视的生活权利或机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削弱,阻碍其抗逆力的提升,进而易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涟漪效应。因此,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可行能力,是增进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着力点。

(三)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主要特点

1.多维性。农村老年人因年老体弱而产生因病致贫,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而难以获得生活照料服务,因子女外出就业和村庄社会资本弱化而引发其精神空虚和内心孤独等风险。因此,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是一个集合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生存和发展的多维概念集。它既包括收入或消费不足所反映的“贫”,也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维度不足所反映的“困”。从某种程度来讲,贫是表征,困

^①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0页。

^②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3—30页。

^③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

是核心。

2.相对性。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相对性是指受制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产生的“城乡相对性”，以及不同群体的脆弱性差异问题产生的“群体相对性”，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使其更容易成为相对贫困的重点群体。

3.持续性。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持续性是指囿于年老体弱、生计能力不足、经济收入减少、照料压力变大和医疗需求增加等因素，农村老年人摆脱贫困风险的能力较弱，使其容易长时间陷入相对贫困。

4.动态性。贫困风险事件、代际支持、家庭经济水平、社会保障政策、疾病威胁等因素，都可能在短期内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程度。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机能下降，农村老年人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呈现增加的趋势。

5.分散性。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分散性是指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不是大规模群体性和区域性出现，而是呈现个体化和分散化^①，农村留守老年人、残疾老年人、失独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相对贫困。

6.代际传递。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由于家庭与环境压力传导、资源投资限制、贫困文化塑造、社会资本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困境会传递给家庭下一代甚至几代人，从而形成家庭内部的贫困代际传递。

二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

我国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研究大多从生命历程、社会保障、代际支持等单一视角进行探讨，侧重于某一种理论假说，忽视了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不能充分揭示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生成机理的分析，应将多种理论整合，构建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从宏观层面(情景视角)、中观层面(文化视角、结构视角)和微观层面(行动视角)的逻辑理路切入，提出“情景—文化—结构—行动”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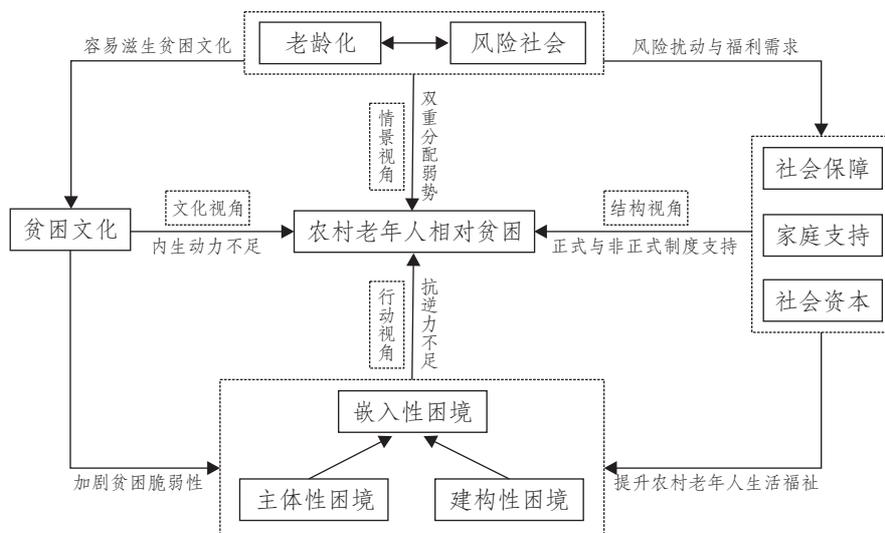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

(一)情景视角:老龄化“遇见”风险社会

2021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2.6736亿,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达到2.0056亿,分别占总人口的18.9%与14.2%,表明我国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②。高龄老人的身体和经济脆弱性程度较高,其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也较高。此外,老龄化趋势增加了家庭照护和经济压力,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一方面,老龄化扩大了农村老年人群体规模,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群体脆弱性,使其处于财富分配的弱势,增加其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风险事件

^①张明皓、豆书龙《2020年后中国贫困性质的变化与贫困治理转型》,《改革》2020年第7期,第99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22年2月28日发布,2022年9月6日访问,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对农村老年人的物质财富和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农村老年人面对风险,具有暴露度高、敏感性强、适应能力弱的特点,应对风险事件扰动的抗逆力和补偿复原力较弱,容易产生较高的养老风险感知。既有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对身体失能风险、陪伴缺失风险的感知较高,而对经济依赖风险的感知较低^①。

当老龄化“遇见”风险社会,农村老年人面临内部风险扰动和外部风险冲击,加上社会支持机制、应急管理制度、家庭福利政策建设滞后,加剧了农村老年人在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上的双重弱势处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极易催生农村老年人的消极态度,使其陷入一种存在性焦虑,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但同时又会激发农村老年人对社会保障、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本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支持的福利需求。

(二)文化视角:贫困文化与内生动力不足

贫困文化是由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一种社会亚文化,主要指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逐渐形成封闭和同质化的生活场域,久而久之塑造了狭隘、消极、孤独、缺乏归属感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心理定势^②。我国的贫困文化主要指部分陷入相对贫困的群体在长期贫困生活和摆脱贫困状态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风俗、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等非物质形式的亚文化^③。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扶贫济困手段以现金和物品为主,缺乏培训、就业、教育等积极手段,部分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而产生“精神贫困”,使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④。贫困文化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贫困文化影响了农村老年人对于相对贫困的情感判断和价值意义,内化为一种消极、悲观、被动的人生态度,加剧了其心理负担和精神贫困。第二,贫困文化阻碍了农村老年人通过积极老龄化策略来摆脱相对贫困的行动力,常表现为消极应对贫困风险冲击,且容易产生福利依赖现象。第三,贫困文化容易产生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家庭的晚辈受到长辈的贫困亚文化影响,逐渐形成消极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成员的代际支持是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的重要来源,由贫困文化而引致的贫困代际传递会直接减少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造成其摆脱相对贫困的内生动力不足,增加其贫困脆弱性,恶化其行动困境,最终使其陷入相对贫困。

(三)结构视角: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支持

1. 社会保障

经济发展不会自然地消除贫困现象,也不会自动地产生利益均沾的涓滴效应,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提升社会公平程度,才能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⑤。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同时还面临身体衰弱和疾病侵袭的风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助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通过采取财政定额补贴的缴费机制、长缴多得的待遇给付机制,缩小农村老年人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强其养老安全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补偿农村老年人身患疾病所花费的部分医疗费用,减轻其医疗负担,降低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实行差额补贴。部分符合相应条件的农村老年人还可纳入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其他社会救助项目的惠及范围,发挥托底线、救急难、保民生的政策效应。调研^⑥发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程度。

在消除相对贫困的新阶段,社会保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然而,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存在体系不完善、覆盖面较窄、转移接续不畅、养老基础设施和服务薄弱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缓解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效力。有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分别是2%与11%,反映出我国

① 聂建亮、樊荣《靠配偶还是靠子女?——农村老人养老风险感知消减的家庭保障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56页。

② Oscar Lewis,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59), 107-127.

③ 方清云《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9页。

④ 李全利《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1页。

⑤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60页。

⑥ 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我国社会保障调节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效果测评及其政策优化研究”课题组赴四川、湖北、黑龙江、云南、福建5省13个地区开展调研。

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①。因此,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应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农村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果。

2. 家庭支持

中国传统文化遵循家庭本位,“扩大了的家庭”是最重要的生产单元和情感单元^②,孝道伦理是家庭养老模式得以维系的道德情感约束。随着中国社会个体化趋势加剧,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年轻一代更具有自我利益的意识,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家庭内涵的情感色彩被淡化,代际关系被一种较多理性、较少亲情的相对平衡模式逐渐替代^③。第一,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农村年轻一代选择离开故土前往城市闯荡,留下大批空巢老人。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农村老年人容易产生物质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第二,逆向反哺。农村老年人生命周期内的任务链条被延长,父辈逆向反哺,需要对子辈给予经济支持,承担孙辈的隔代照料任务^④。逆向反哺,将年轻一代的压力部分转移给老年一代,弱化了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养老功能,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负担。第三,伦理陷阱。中国年轻一代面临着独自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难题,但相应的社会支持机制、家庭福利政策建设滞后,使其独自再嵌入社会的行动受阻,逐渐塑造出强调亲子一体、代际依附的“新家庭主义”观念^⑤。部分农村家庭转型出现了伦理陷阱,具体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底线生存、家庭内部权力结构边缘化、价值实现呈现依附状态^⑥。

3. 社会资本

农村社会是一个讲究人情、面子、关系的熟人社会,农村老年人具有看重人情世故、维系关系人脉的社会交往习惯。调查表明,礼物赠送、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是农村重要的社会援助体系,它在农村居民遭遇危机情况时,能够为其提供来自亲朋好友的基本生活物品和社会援助,从而发挥一种非正式保险制度的功能^⑦。中国社会的“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强连带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的特征^⑧,借助地方性共识约束、非对称性交换、预防性动机三种行动机制,为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应急管理提供邻里间的互助共济,从而释放一定程度的减贫效应。近年来,各地实践了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抵偿服务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旨在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⑨。随着市场经济渗透、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加速,部分农村地区逐渐由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⑩,农村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和理性化趋势,由此带来村庄社会资本结构异化、总量偏低和存量下降^⑪,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结构的凝聚力,弱化了村庄社会资本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的效力。

(四) 行动视角:主体性、建构性和嵌入性的三维困境

1. 主体性: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可行能力不足与主体性地位弱化

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作用于客体的实践过程中所展现的自觉能动性,包括自主性、创造性、自为性、选择性等^⑫。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困境,严重制约其可持续生计的能力,加剧其贫困脆弱性,使其容易陷入相对贫困。其一,农村老年人的身体、情感和经济脆弱性。2018年,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表明,超过42%的

①王晶、简安琪《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26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③贺雪峰《农村家庭人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第113页。

④许琪《扶上马再送一程: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社会》2017年第2期,第216页。

⑤Yunxiang Yan,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Boston MA: Brill Academic, 2021), 1-25.

⑥李永萍《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2期,第124—126页。

⑦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9页。

⑧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第107页。

⑨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页。

⑩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⑪乐章、向楠《熟人社会:村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差异》,《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5期,第76页。

⑫李为善、刘奔主编《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源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①。身体机能衰退和疾病风险侵袭,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压力、照料压力和精神压力,从而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并掣肘农村老年人摆脱相对贫困的实践能动性。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的情感需求强烈,但往往又得不到有效的情感抚慰^②,造成其情感抚慰不足。加之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营养水平不足、专业技能薄弱、家庭人口众多,容易诱发累积性劣势效应^③。进入老年后,一旦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容易让原本不宽裕的生活雪上加霜,衍生出慢性贫困,恶化农村老年人面对贫困风险的选择性和自主性。其二,农村老年人的可行能力不足。年龄、身体、疾病和精神等因素限制了部分农村老年人赚取收入的能力,其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才能实现与他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由此造成了农村老年人的可行能力不足。其三,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弱化。在消除绝对贫困时期,贫困群体成为扶贫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扶贫贫困手段以现金补助和物品发放等方式为主,缺乏持续提升贫困群体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的能力。在消除相对贫困的新时期,相对贫困的多维性、相对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特征,使得农村老年人的权利实现不充分和自身能力不足的主体性地位弱化问题更加明显。

2.建构性:老化隐喻与农村老年人行动困境

部分社会成员用片面、消极的眼光看待农村老年人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和身患疾病等老化现象,将农村老年人视为待养或待助的群体,加剧了其边缘化地位,导致其陷入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的贫困经历又对自身老化态度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使其难以摆脱相对贫困。此外,在农村地区,面子和关系具有很强的行动约束力和道德惩戒力,领取低保的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容易遭遇不公平经历,加剧其社会交往的行动困境。

3.嵌入性:农村老年人再社会化行动受阻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提出“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观点,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老年人再融入社会,促进其社会交往和再就业,释放老年人口红利。但主体性和建构性的困境,造成了目前农村老年人的嵌入性困境,即农村老年人再社会化行动受阻。对于农村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和残障老人,主体性的弱化和建构性的负面隐喻使其经济状况不稳定、劳动负担增加、文化生活匮乏、精神慰藉缺乏。同时,农村缺乏相应的政策配套、平台搭建和环境培育,使农村老年人再社会化行动受阻,很大程度限制了其改善自身生活福祉的能力以及应对风险事件的抗逆力,增加了其摆脱相对贫困的难度。

三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

(一)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前提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前提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程度。在消除绝对贫困时期,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的识别采取单维识别法,标准为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2010年不变价)^④。依此设定的反贫困政策属于兜底策略,主要解决绝对贫困群体的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病无所医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⑤。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的深入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反贫困实践愈发重视人的实质自由和全面发展^⑥。相对贫困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多维性,包括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生存和发展等多维指标。因此,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识别应采取多维识别方法,以新时代美好生活需求和农村老年人群体特殊性为建构依据,囊括物质财富指标和可行能力指标,兼顾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具体而言,多维识别标准应包括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生活质量、社会保险、社会参与、主观福利。这六个维度既反映了人民日益增长

①《国家卫健委: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打赢健康脱贫攻坚战》,人民网,2018年4月25日发布,2022年9月6日访问,<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8/0425/c14739-29949739.html>。

②苏珂、李付星、李月恩《农村空巢老人的情感诉求及抚慰策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79页。

③胡薇《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社会》2009年第2期,第126页。

④《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4月6日发布,2022年9月6日访问,<http://www.scio.gov.cn/ztk/dtzt/44689/45216/45224/Document/1701692/1701692.htm>。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⑥汪三贵、胡骏《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第4页。

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共性,也抓住了农村老年人群体面临的真实生活情景的特殊性,避免了识别维度与主体需求不契合的伪识别问题。

(二)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基础

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弱化和老化隐喻问题造成了其再社会化行动受阻,使其摆脱相对贫困的难度较大,需要多元主体协同解决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问题。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应践行多元共治模式,吸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村老年人等主体,充分发挥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各级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农村营商环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党员干部与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结对帮扶活动。企业应发挥人才、技术和资金的优势,推进技术扶持、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产业帮扶工作,帮助农村老年人再就业,促进农村老年人增收致富。社会组织应充分利用其组织灵活性强、资源整合能力强、专业性强、动员力量强的优势,发挥其连接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纽带作用,链接多方的政策、人才、技术、资金和信息资源,继续实施健康帮扶、文化帮扶、产业帮扶等结对帮扶项目,开展关爱农村老年人的志愿服务、慈善公益等活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农村老年人应树立积极老龄化的人生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加强再就业培训,培育可持续生计的能力。

(三)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关键

贫困文化掣肘内生动力的文化要素,社会保障、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本的结构要素,均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关键是完善发展型社会政策,激活农村老年人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可行能力。第一,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各级政府应积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推广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对无子女赡养且未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的低收入农村老年人群体给予参保上的政策倾斜,实现农村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的补贴全覆盖。加快日间照料中心、时间银行、村级幸福院等农村养老机构建设,促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医疗硬件升级。社会救助制度应构建“大救助”体系,拓宽陷入相对贫困的农村老年人的救助范围,适度提升救助水平。第二,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家庭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情感慰藉和服务保障。将“家庭发展能力”理念贯穿于家庭政策体系完善的全过程,统筹“上游干预”和“下游保障”,制定农村老年残疾人家庭、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的配套政策,加大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的教育、就业、养老、家政等服务的政府购买力度,加强农村老年人家庭的资产建设,完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推动农村老年人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激活家庭养老功能。第三,推进社会投资型反贫困模式。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内在根源在于可行能力不足,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是激发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发放现金和物质补助的反贫困模式,虽然在短时间内能改善贫困者的生活质量,但不利于强化个体抗逆力和长期福利增进。基于此,应推进社会投资型反贫困模式,坚持以福利促发展的行动路径,开展“产业+就业+健康+文化”的综合治理行动,对农村老年人赋权增能,激发其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其可行能力,助力其再嵌入行动,从而达成长效扶志、扶智、扶贫的全景目标。

(四)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①。在消除相对贫困的新时代,精神富裕、能力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农村老年人对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社会交往等美好生活需求得到激发,使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关键点从“贫”转向“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应立足于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重视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采取多维识别、多元共治、扶志扶智、文化培育、能力发展的治理策略,从保障型社会政策转变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满足农村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农村老年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责任编辑:钟秋波]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